

土伊争端中的自卫权问题浅析

陈虹睿

摘要: 随着当今世界国际政经关系日趋复杂,国际法学界对自卫权的分歧也愈演愈烈。不久前土耳其跨境打击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武装的事件,又引发了一场国际社会关于自卫权的激烈论辩。本文试图以此事件为样本,在国家自卫权理论的基础上,辨析自卫权的概念并讨论相关证据的收集、组织等问题。本文并无意评判事件本身之合法性,而是希望能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通过给出一条有关自卫权证据链收集、组织的通用路径,为国际社会处理类似事件提供有效的借鉴。

关键词: 土伊争端 自卫权 武力攻击 国家责任

究竟是国家分裂,还是民族自决?对这一现象,长期以来不同的社会群体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而当这一问题又与宗教和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土耳其就一直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在2007年10月15日,土耳其内阁正式决定越界打击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并要求国会16日对此项地面军事行动进行表决。但事实上,土国部队早在14日便已经开始炮击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族自治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做出此类决定之前,一般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角度权衡其利弊,他们都会考虑国际舆论,总是会找到各种理由来证明这种行动的合法性。特别是当面对舆论的非议和指责时,当事国更是努力通过法律依据来申辩自己行为的正当与合法性。然而这些努力有时并不一定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事国的行动本身与国际法的准则相去甚远,另外一种情况则是因为当事国在申辩过程中举证不当,他们由于未能充分地或者有针对性地展示相应的事实来支撑自己的申辩理由,因而无法形成国际法所认可的证据链。以上述土耳其出兵伊拉克事件为样本,本文将围绕当前国际争端背后的“自卫权之争”,梳理和讨论自卫权的概念特别是相关证据的收集和证据链组织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对土耳其出兵伊拉克这一事件本身进行评判或褒贬,而是旨在通过剖析这一个案,为在国际法

的框架内处理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思路和途径。

一、“自卫权”的概念及其内涵

无论是跨境的空中打击,还是尚未付诸实施的出动地面部队,土耳其出兵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虽然不能立即确认它违反了国际法,但毫无疑问,当代国际法极力限制这些行动。《联合国宪章》第二章第四条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领土是一个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包括一国疆界以内的陆地、水域、底土及上空。国际法承认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排他的管辖权。土耳其轰炸伊拉克境内的目标,是用武力方式侵犯伊拉克的领空,而土耳其宣布派遣部队进入伊境内开展军事行动,则是用武力威胁的方式侵犯伊拉克的领陆,这两种方式都危及伊拉克的领土完整。

站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土耳其方面可能会试图通过援引“自卫权”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合法正当的。自卫权是指当国家遭到外来的武装攻击时(攻击者为外国国家或类似国家实体),可实施单独的或集体的武力抗拒攻击者,以保卫自身生

* 陈虹睿,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 西安710049。

存独立和安全的权利。^①究其权利属性而言,它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项自有权利,不容剥夺和克减。权威的法学论著中对此有如下论述:“根据国际习惯法,任何国家都没有义务在另一个国家采取了有损于它的受合法保护的利益时保持消极。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形,受影响的国家有权采取反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有非法武力的形式;涉及武力的反措施,由于《联合国宪章》第二条 4) 的规定,现在通常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然而,如果一个国家受到攻击,它就有权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以防卫自己不受攻击,击退进攻者并将其赶出国境。”^②“9·11”恐怖袭击之后,联合国安理会曾再次声明,独自或集体自卫权是一个国家固有的权利。^③但在此次事件中,土耳其能否成功地利用“自卫权”为自己跨境打击的行为申辩,却并不确定。因为经过多年演变,特别是在全球反恐的当下,自卫权的内涵及外延已不十分清晰。

纵观各类文献资料可以看出,“自卫权”的概念由来已久。著名国际法学家艾默里克·德·瓦泰尔(Emerich de Vattel)在其1758年出版的著作《国家法》中提到:“一个国家有权去抵抗危害的威胁,无论是谁,只要它事实上从事反对该国的行动,该国家就有权使用武力以及任何正当(honorable)的对策去反对它。”^④在该书中,作者将上述权利命名为“反抗权”,这虽然与“自卫权”存在字面差别,但是据其定义,可看出它与当今的“自卫权”并无实质区别。此后许多国际条约都确认了国家的自卫权,例如1919年的《国联盟约》、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以及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⑤二战后,随着国际新体系的建立,自卫权得以法典化,《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51条中对此予以了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

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此项办法于任何方面不得影响该会按照本宪章随时采取其所认为必要行动之权责,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有学者认为,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是对习惯法上的自卫权的限缩。^⑥如果是这样,则意味着国家实际上享有的自卫权要多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但后者目前仍是国际上用来检验国家行为是否符合“自卫权”的首要文本依据。因此,无论是对于自卫权的内涵进行深入辨析,还是具体判定本次事件中土耳其政府是否享有真正的自卫权,我们都应首先以《联合国宪章》第51条为起点展开研究。

二、几个关键证据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对土耳其出兵伊拉克这一事件的国际法分析将涉及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即:(1)土耳其是否受到武装攻击?(2)安理会是否已采取必要措施?(3)即使土耳其受到武力攻击,但是这些武力攻击是否可归因于伊拉克,换句话说,伊拉克是否要为库尔德武装分子的武力攻击承担国家责任?

下面我们对以上问题分别加以讨论。

(一) 土耳其是否受到武力攻击

此问题又可细化为两点:其一,武装攻击的实施者是否必须是国家,恐怖组织的恐怖活动是否可称之为攻击。其二,什么程度范围的攻击可称之为武装攻击。在尼加拉瓜案件中,国际法院认为恐怖活动并不等同于“武装攻击”。^⑦而且,国内爆发的单纯的恐怖袭击是不能适用于自卫权的。仅就文本来

① 周鲠生:《国际法》(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7页。

② [英]奥本海:《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

③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373(2001)号决议, S/RES/1373(2001), 2001年9月28日,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1/s1373.htm>;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368(2001)号决议, S/RES/1368(2001), 2001年9月13日,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1/s1368.htm>, 2008-1-10。

④ 转引自 Mikael Nabati, “International Law at a Crossroads: Self-defense, Global Terrorism, and Preemption”, Transnational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13, No. 2, Fall 2003, note 5, p. 775. 关于瓦泰尔的思想,可参见 Emmerich de Vattel, The Law of Nations (1758), <http://www.lonang.com/exlibris/vattel/index.html>。

⑤ George K. Walker, “Anticipatory Collective Self-Defense in the Charter Era: What the Treaties Have Said”,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1, No. 2, 1998, p. 344.

⑥ Mikael Nabati, “International Law at a Crossroads: Self-defense, Global Terrorism, and Preemption”, p. 775.

⑦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erits, Judgment, Reports 1986, p. 103,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70/6503.pdf>, 2008-1-10。

看,《联合国宪章》第4条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不得对另一个国家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与第4条规定不同的是,第51条文本中并未明确指出武力的实施者必须是国家。但在传统实践中,武力的实施者一般只局限于国家,有学者认为,根据“内部联系”要求,既然《联合国宪章》第4条明确指出该条款涉及国家之间关系,不适用国内暴力行为,那么同一个宪章中的第51条也应该采用较为严格的解释方法,不应轻易扩张该条的适用范围。^①针对上述争论,联合国安理会第1368号决议做出了新的阐述,表示国家有权行使自卫权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王铁崖教授认为:“恐怖主义是具有国际政治目的的由私人或有组织的团体伤害他人生命或损害他人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受到国家的支持或者甚至是国家所发动的,称为‘国家恐怖主义’。”^②这表明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当代国际恐怖主义与以往任何时候的恐怖活动都不同,它们使用的手段更加多样,影响更加深远,甚至带有种族灭绝等恶劣目的,^③如果不能赋予受害国更多的活动空间以实施自卫权的话,对于受害国甚至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将是异常危险的。在本案中,土耳其打击的目标是在伊拉克北部境内活动的库尔德工人党,而该党已经被联合国、欧盟等多个国际组织确认为“国际恐怖组织”。据此我们可以认定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具有成为武装攻击的主体资格。

再来看武装攻击的定义。根据《国际法院对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中比尔根塔尔法官的声明:“以色列的自卫权与本案是否相关,必须审视以色列本土遭受跨绿线致命恐怖袭击的性质和规模,以及就此种袭击而言,整个或部分隔离墙的修建是否必要,是否相称。”^④由此可见,只有当攻击达到一定程度和规模时,才可称之为武装攻击。这一点在卡罗琳(Caroline)案件中也被确认。比例原则禁止一个国家使用武力超过抵制攻击或是恢复原状的必要程度。^⑤

而且一个合法的自卫行为不能仅仅是为了惩罚或是报复目的。^⑥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库尔德工人党,开始频繁在土耳其东南部开展游击活动,至今已造成近四万人死亡。近两年来,该武装组织又以伊拉克为基地,频繁对土耳其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导致土耳其安全形势再度恶化。在这种情势之下,土耳其是否有必要在空中打击之外还进行地面攻击,是否有必要在与伊拉克联合行动之外采取单独行动,这都关乎比例原则,本文因为缺乏必要的调查和证据暂不作判断。

(二) 联合国安理会是否已采取了化解危机的必要措施

自卫权是受害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权利,无需经过安理会的授权。但是联合国一直致力于减少国际社会的同态复仇,因为这种同态复仇往往会引发更多的仇恨和杀戮,在安理会授权下统一行动则可避免这种不良后果。可以看出,《联合国宪章》在拟定各项制度时充分贯彻了该项原则,即在尊重受害国行使固有的自决权权利的同时,保证安理会有能力介入事件并采取相应措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如果安理会已经采取了行动,那么按照宪章第51条的规定,受害国是否应当中止单方面的自卫行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传统观点认为,如果安理会已经有所行动,受害国应当中止其自卫行为,但是笔者认为,这样一概而论似乎并不合理。如果安理会的行动软弱无力,并不足以维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那么受害国就不该中止其自卫行为,因为这种中止对维护和平无益,有时会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从近几年安理会的实践来看,这样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9·11”事件发生后,同月28日安理会仅发表了决议,禁止各国向恐怖组织“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联合国安理会虽然也在很短时间内做出了谴责侵略行为的决议,但却直到四个月后才授权成员国使用“所有必要的手段”击退伊拉

① Carsten Stahn, “Terrorist Acts as Armed Attack”: The Right to Self-defense, Article 51(1/2) of the UN Charter,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Vol. 27, Issue 2, Summer/Fall 2003, p. 43.

② 王铁崖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81年,第342页。

③ 对于“9·11”后现代恐怖主义与以往恐怖活动之区别,参见 Mikael Nabati, “International Law at a Crossroads: Self-defense, Global Terrorism, and Preemption”, p. 774.

④ 国际法院:《国际法院对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A/ES-10/273),2004年6月13,第81页, <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alestine/backgrounds/documents/AES10273.pdf>, 2008-1-10.

⑤ Mark B. Baker, “Terrorism and the Inherent Right of Self-Defense”, Bost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No. 25, Autumn 1987, pp. 25, 35.

⑥ Mary Ellen O'Connell, “Lawful Self-defense to Terrorism”,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Vol. 63, No. 4, Spring 2002, p. 892.

克的侵略。上述事件表明,由联合国安理会做出的先期的决议不应该导致受害国的自卫行为停止,事实上当事国自卫行为也确实并未因此而停止。由此可见,在国际习惯法的层面,安理会决议对自卫行为的影响已有一定程度的修正。^①受害国停止单方面的自卫行为的前提已经有所扩充,即联合国不仅有所行动,而且它所提供的行动,是一个从表面上看已经足以恢复和平与安全的行动。

(三) 伊拉克是否应为库尔德工人党的武力攻击承担国家责任

前文提到,土耳其的空中打击,以及越境派遣地面部队的威胁都损害了伊拉克政府的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不过目前并无证据显示伊拉克的国家部队曾直接参与到库尔德工人党对土耳其的恐怖袭击中。那么只有在证明伊拉克需要为库尔德人的恐怖袭击负有国家责任的前提下,土耳其的上述行动才是合法的自卫行为。

然而,目标国何种类型的行为可以作为他国主张自卫权过程中的归责因素这一点却并不明确。一般而言,可以粗略地将目标国的行为分为容留或其他形式的支持。首先,各方对于容留行为态度不一,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宣称:我们对实施恐怖行为的当事人与收留他们的国家之间不做区分。^②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仅仅收留这些组织并不能使其成为自卫行为进攻的对象。^③其次,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不当,这随后发展为一项国际准则。1970年

联合国《友好关系宣言》表示:“每一国皆有义务避免在他国发动、煽动、协助或参加内争或恐怖活动,或默许在其本国境内从事以犯此等行为为目的之有组织活动,但本项所称之行为以涉及使用威胁或武力者为限。”^④其后,1994年联合国发表的《消灭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⑤、2001年联合国安理会发布的第1373号宣言都重申了同样的原则。但是这样的支持行为是否可以构成宪章的51条所说的“武装攻击”,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这从国际司法机关的判决中就可以看出。在尼加拉瓜案中,法庭认为,“如果只是给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支持,那么只能构成干涉他国内政,而不是构成使用武力。”^⑥也就是说在尼加拉瓜案件中,国家并没有因为其资助某项行为就承担该项行为的国家责任。^⑦而在另一起国际法案例中,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曾指出,“在军事行动中担任组织、策划、协调的角色,以及在训练、装备、提供军事行动的支持给予资金支持”都可以导致与实施人同样的责任。^⑧

以上这些证据表明,一国即使没有直接参与恐怖活动,也可能因为与恐怖活动有关的其他连接因素而承担国家责任,这不存在争议。但是哪些连接因素会导致国家为恐怖活动承担国际责任,却并不明确。如果要确定这些连接因素的具体范围,笔者认为应当从侵权法基本原则中寻找突破口。主要需考虑以下两点:

第一,目标国不能以自身的疏忽和懈怠作为理由。国际法委员会颁布的《国家责任法》(草案)^⑨第

① Thomas M. Franck, "Terrorism and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5, Issue 4, October 2001, pp. 841-842.

② George W. Bush,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Terrorist Attacks, Washington, September 11, 2001,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6/09/20060911-3.html>, 2008-1-10.

③ Mary Ellen O'Connell, "Lawful Self-defense to Terrorism", pp. 889, 902.

④ 联合国大会决议:《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联合国, A/RES/2625 (XXV), 1970-10-24, 第10页。

⑤ 联合国大会决议:《消灭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联合国, A/RES/49/60, 1994年12月9日,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GEN/N95/768/18/IMG/N9576818.pdf?OpenElement>, 2008-1-10.

⑥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erit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6, p. 228,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70/6503.pdf>, 2008-1-10.

⑦ Davis Brown, "Use of Force against Terrorism after September 11th: State Responsibility, Self-defense and other Responses", Cardoz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11, No. 1, Spring 2003, p. 16.

⑧ Prosecutor v. Tadić (Case No. IT-94-1-T). Opinion and Judgment, ICTY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May 7, 1997, p. 137.

⑨ 虽然这样的草案不具有国家条约的性质,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存的国际惯例、法律原则以及国际法专家的意见,而这些都是国际法的渊源。

一条规定,当事国应为其国际过错行为承担国际责任,紧接着第二条对何为“过错行为”作了解释:“国家的国际过错行为表现为如下的行为或疏忽:(a)根据国家法该行为或疏忽可以归因于国家;并且(b)该行为或疏忽违反了该国家的国际义务。”^①由此可见,自卫行为所针对的目标国并不一定非得有积极参与武装攻击的行为,目标国的疏忽或懈怠行为也可以成为其承担责任的理由。

第二,一般而言,侵权责任分为原始责任(original responsibility)和替代责任(vicarious responsibility)。通过原始责任将某项行为后果归罪于非行为人,这就需要证明非行为人既向行为人的行为提供了积极帮助、支持,同时也在行为前就知晓行为人的计划,即在意图上存在“共通”。而通过替代责任将某项行为后果归罪于非行为人,所要证明的事情就更加复杂:非行为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控制行为人的行为,同时由于非行为人疏于控制、管理导致行为人的非法行为扩大和延续。

因此,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法律不支持国家仅仅因为其收留恐怖分子而承担责任。^②回到本案,如果是伊拉克政府主动提供驻地,或为恐怖组织提供武器、运输等便利条件,都会导致其承担原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领土国,伊拉克有责任制止本国境内针对其他国家的恐怖行动,土伊两国2007年9月28日签订的《反恐合作协议》再次确认了伊拉克的该项责任。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近几年来伊拉克国内形势不稳定,政府对其内部的控制能力下降,伊拉克不一定有能力制止其境内行为,因而根据替代责任归责要求,不能仅凭伊拉克政府的控制行为不力来推定其应承担的国际责任,这一方面需要更深入的证据。当然笔者也注意到,有报纸报道,伊拉克北部自治地区政府资助、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活动,如果这些报道属实的话,伊拉克必须就此向土耳其承担国际责任,因为地方政府行为可以归责于中央政府。另外还有报道说,恐怖分子在伊北部的官方医院接受治疗,笔者认为根据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的精神及原则,官方医院的行为是应当作为责任豁免的,官方医院为受伤的恐怖分子提

供必要的医疗救助不能成为伊拉克政府资助恐怖组织的证据,但是如果医疗救助不仅仅是必要的,就应归责,但是在这一点上还需要其他证据。

三、证据的证明力

由于缺乏更进一步的资料,因此笔者不愿在本文中草率得出结论,表明土耳其的自卫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本文的目的旨在试图绘制出一份“路线图”,当事国可以根据这份“路线图”组织证据链申辩权利,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一途径搜集证据,再根据这些证据来分辨土耳其的行为属“是”或属“非”。当然这就难免关系到另外一个国际法问题,即证据需要到达的证明力。在科孚海峡案中,法庭要求证据的证明程度达到“没有合理的怀疑”,^③而在对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总统布什发表演说,声称:“面对明显的危险信号,我们不能等待最后的证据,(情况非常紧急)就如面对同一个正在冒烟的炮口,——它最后可能会造成蘑菇云。”^④这也被称之为“布什原理”,很明显,该原理对证据证明力的要求要远远低于科孚海峡案件的要求。虽然单方面的声明是不可能成为国际法渊源的,但它一经发表,便获得相当的信众,这无疑表明这项“鲁莽”的原理背后有一点合理因素。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这无疑是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科孚海峡案件的证据要求太高,会延误宝贵的时机,尤其难以适合反恐战争。另一方面采用“布什原理”则显得过于草率,这种草率很可能将国际社会置于霸权主义的阴影之中。国际社会将不得不在上述两个标准中选择平衡点。因此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借鉴尼古拉瓜案件判决,在该案件中法庭强调:“(1)当事国应该认真地评估证据,以确保可以识别出攻击的责任人以及判定更多的攻击迫在眉睫的证据(的证明力)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2)这些事实向公众公开。(3)这些证据可以接受国际的调查证实。”

(责任编辑:吴文成)

① 国际法委员会:《国家责任——基于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责任》(二读版本),联合国文件 A/CN.4/L.602/Rev. 1, July 26, 2001.

② Mary Ellen O'Connell, "Lawful Self-defense to Terrorism", p. 902.

③ The Corfu Channel Cas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 Albania), Merits, Judgment. I. C. J. April 9, 1949, p. 18.

④ George W. Bush,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Iraq, Ohio, October 7, 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10/20021007-8.html>, 2008-1-10.

approach to warfare, which takes UN Charter as its legal frame and combines othe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and has brought warfare into its scope of legalization and bureaucratization. The impacts of the approach can be shown in creating an international peace trend; furthering the multipolarization of the world;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organizations and reducing the military effects on civilians. Meanwhile, the approach is also revealing its limitations and needs to be adjusted.

An Analysis of the Self- Defence Right in Turkey- Iraq Confli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97)

CHEN Hong -rui

A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tend to be more and more complex, the doctrine of self- defense has become a subject of controversy. The recent Turkish army's strike against Kurdish rebels in Iraq has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debate. Focusing on this ev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of self- defense right, and how to collect and organize relevant proof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not to simply judge the event's legitimacy, but to attempt to give a common way for the col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proofs- chain about self- defence right,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 for dealing with similar international incidents.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Unidimensinal Relevance Analysis (102)

SHI Xian-ze

As a sub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udy has shown several historical features. Temporall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udy didn't come up until the late seven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spatially, it occurred actually in America; theoretically, it has existed mainly in neoliberalism.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track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udy. Specifically, the evolution of country's intellectual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volution of paradigm's intellectual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Great Debates as the dynam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velopment, and the behavior and language r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l together explain, in some degrees, wh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udy has developed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nalysis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featur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is a unidimensional analysis, which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tudy.

Review

The Ways for Regional Governance of East Asia Security-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East Asia Security (110)

GUO Yan-jun